

文史资料选编

第三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文 史 资 料 选 编

Wenshi Ziliao Xuanbian

第三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21,000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00

ISBN 7—200—00205—4/K·21

书号: 11071·509

定价: 2.10元

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 “九·一八”前后我的东京之行……………宁向南(1)
- 淞沪抗战时的幕后活动
- 蒋作宾日记摘抄……………蒋作宾 遗稿(11)
- 国际主义战士·国际友人·日本间谍
- 平西抗日根据地二三事……………彭 城(32)
- 川滇东路运输线上见闻散记……………苏从周(42)
- 关于昆仑关战役的回忆……………黄 翔(54)
- 孙立人将军率部在印缅抗日作战纪实
- ……………马孝贤(62)
- 何基沣重庆受审记……………洪大中(71)
- 抗战前夕宋哲元将军所辖冀察两省、
- 平津两市军政人员概况……………张廉瀛(88)
- 敌伪时期北平的策反工作……………田淑平(98)
- 从北京回教会到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牧 夫(107)
- 《狱中杂记》的狱外记……………林培志 遗稿(122)
- 日军关闭燕京大学前后见闻……………武占元(130)
- 新发现齐白石反抗日寇统治的题句……………齐良迟(135)
- 北京古玩行与日商山中商会、三井洋行
- ……………邱震生(138)

“通州事变”见闻	伟 翰(144)
“庆祝徐州陷落大会”的余波	郭东郊(149)
人间地狱话劳工	何贵生(152)
十年京兆(三)	张友渔(157)
新近发现的一封信	(171)
叶恭绰与叶恭绍书	(180)
朱启钤与《存素堂账目》	叶祖孚(187)
孙中山先生在天津张园	张 挺(205)
先姑母林宗素女士事略	林慰君 遗稿(208)
我所知道的顾孟余	顾彦和(216)
片断的回忆	
——忆父亲钱玄同	钱秉雄(223)
回忆我的父亲齐如山	齐 香(235)
司徒雷登返美以后	徐 英(245)
北京图书馆变迁纪略	赵其康(250)
北京书市谈往	张次溪 遗稿(285)
歌场趣谈	齐如山 遗稿(295)
勘误表	(310)

“九·一八”前后我的东京之行

宁 向 南

1929年秋，世界资本主义各国陆续卷入经济危机。1931年，日本的经济、政治危机达到了顶点。为了缓和国内面临的空前严重的危机，日本反动政治集团按照1927年“田中奏折”中“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反动国策，于1931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订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此后，日本关东军和间谍机关活动频繁，加紧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步伐。当时我任天津市捐务处处长。7月初，我得到消息，日本的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华北驻屯军和日本特务机关的头头，在天津租界内海光寺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开会，欲对中国有所行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已和石友三拉上关系，让石友三率部向北进攻打到北平，以搞掉张学良将军，彻底扫除侵占中国东北的障碍。我从天津回北平时，在火车上遇到了日本特务江滕。他是个中国通。在和他交谈中，我弄清了海光寺会议的结果——日本军人对张学良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回到北平后，我将这些情况通过张学铭先生转告了张学良将军。由于我在东京日本帝国大学当研究生时，曾任张学良将军在东京办的同泽俱乐部的干事，为张将军做过一些对日上层人物的交际工作，与

当时日本政界、军界的人比较熟悉，所以张将军与张学铭商量后，决定派我到日本去摸摸情况，了解日本政府和军方的动向。

接受任务后，我回到天津，以到东京“考察市政”的名义，同日本驻天津领事桑岛进行了联系。就在我临行之前，土肥原得到我要去日本的消息，派人来对我进行劝说。来人对我说：“老宁，你要去日本吗？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土肥原跟我说了，石友三的部队夜袭很有名，勇不可挡。几天以后小张（指张学良将军）就完了。所以你也不必去日本了。”我当然并没有听他的“劝告”。不过这些话却证明了土肥原命令石友三向北进攻的阴谋。

7月中旬，我从天津坐船去日本，开始了这次不寻常的出国考察。当船行驶到日本濑户内海时，一个日本人拿了一张小报给我看，上面登着石友三部在琉璃河被于学忠部队消灭的消息。看后我感到非常振奋。

到东京后，我住在帝国旅馆。日本外务省派林权助（张作霖时期曾任日本驻中国公使）的儿子接待我。他是外务省的一个课长，曾在日本驻北京领事馆工作过，我和他是在北京香山碧云寺避暑时认识的。临来日之前，张学良将军让我向币原外相和南陆相转送由他亲笔写的问候信和有他签名的照片，我自己又花了80元钱买了两套景泰蓝烟具作为礼品准备送给他们。同外务省取得联系后，我转交了信件、照片和礼物，并约定了会见币原外相和南陆相的时间。这时，我在帝国旅馆遇到了当时汪精卫广东政府的陈友仁（广东政府外交部长）和刘纪文，他们都带着夫人，比我先到日本。几天后他们就回国了。事后我听说，汪精卫派他们来日本，与日本参谋本部联系，向日本要钱要军火，谋求日本军方对广东政府的支持。

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到日本外务省会见了日本外相币原。见面后彼此先是互相寒暄了一番，接着我就开门见山地问他道：“目前中日两国情况十分紧张，阁下看是否会有发生战争的可能？”币原回答说：“因为日中两国间有着地理上分不开的联系，我们是邻居，又是这样近，在这样的地理情形下，两国关系恶化了就要打仗，善化了就可以不打仗，应该是善化还是恶化，据我看，这两个国家间与其作成恶邻，毋宁作成善邻才好。日中亲善对两国都有好处。”我接着说：“我们同意中日亲善，不过最近你们的朝鲜总督、台湾总督都回到日本在陆军省开会，驻中国的军队首脑也在天津开了会，局势紧张，会不会要打仗啊？我来的目的是希望不要打仗，希望能够和平。”听了我的话币原稍微停顿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看呀？军人开会是常有的事。军人这种动物连晚上作梦都是打仗。我推行的政策是不打仗，满蒙这个地区放在那儿是个宝贝，如果吞下去就像吞了个炸弹，我反对吞并满蒙。”接着他又说：“我有个好朋友奥斯汀·张伯伦（即英国首相张伯伦之兄），他是英国的外交大臣，是世界上有名的外交家。我曾经问过他：‘你办外交的方法是什么？’他回答我说：‘我办外交的方法很简单，一件事发生后，先看这件事要是办的话，是否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看来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那就千万不要办；看出来能办到，就办！’我觉得张伯伦的说法确是经验之谈。我对外交的看法也是这样，日本和中国的客观情况规定了谁也不可能把谁推到海里去，所以我是不同意以武力夺取满蒙的。”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接着我又问他，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什么。币原说：“我主张对中国实行经济外交政策，这就是让我们两国共存共荣，大家都能活下去。我们是邻

居，又这样近，在这样的地理情况下应该是这样。我将尽我的职责。如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些成就，那么我们民政党内阁就可以抑制日本军人的活动。”在谈话的最后，我表示：我们很愿意和日本外务省联系，通过外交途径先着手解决“万宝山事件”^①、“中村事件”^②和东北铁路等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币原则希望能尽快办理。币原和我谈话的时间很长，从他的谈话里我感觉没有要打仗的意思。

同币原会见后的第三天上午，我又会见了南陆相。谈话正式开始后，我开门见山地问他对中日两国间的形势怎么看，我说：

“现在要打仗了，亚洲的和平都在于阁下的决定，您决定不打就一定打不成。”南陆相叹了口气，说：“唉！现在的事情是这样，对这些年轻的军人我也按不住。”同他的谈话时间不长，临告辞时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国，我说大约两个星期之后，他说：

“宁桑（先生），你在回国前再来一趟好吗？”看来他还有话要说，我答应回国前再去见他。

因为我是以“考察市政”的名义到东京的，东京市政府安排我参观了许多市政设施，林权助的儿子还陪我参观了东京警察厅、民政局、财务局。由于我另有使命，所以参观时也是走马看花，但表面上还得做出一副考察的样子，假装问这问那，心里却焦急万分。在这期间，我还会见了当时的东京市长池田和张学良将军的故交好友大仓喜七郎、町野武马和贵志等人。

① 指1931年7月日本侵略者在吉林长春万宝山村制造的屠杀中国农民和挑拨中朝关系的事件。

② 指1931年8月日本侵略者利用参谋本部军官中村潜入黑龙江搞间谍活动，被中国驻军击毙之事。

东京市长池田是政友会成员，是个死硬的好战派。我问他对中日两国间目前的关系怎么看法，他竟赤裸裸地说：“在满洲，张学良什么也没给我们，我们一定得打仗！”见他这样蛮横无理，我很快就告退出来。

大仓家族是在日俄战争中发财的大资本家，大仓喜七郎与张家父子在经济上也有联系，东北的本溪湖铁矿就是大仓喜七郎的父亲与东北政府合办的。大仓家凡有婚丧嫁娶等大事，张家都派代表参加，所以关系很深。那天，大仓喜七郎见我去找他，别的什么也没问，只是紧张地对我说：“您怎么在这个时候来？这儿很危险，您快走，快走！”

町野武马原是张作霖的顾问（1928年张作霖被炸，町野与张作霖同车离开北京，在天津下的车）。我一到他家，见他正站在廊下。他见到我像见到一个可怕的人物，显得比大仓喜七郎还要紧张，他挥着两手冲我嚷道：“唉呀，不好了，您怎么在这个时候来日本？这太危险了，他们会杀了你的！我不能让您进屋里坐，您快走，快回去吧！留在日本危险！”看到这种情形，我也就不便再多说什么了。

贵志中将也是张家父子的老朋友。我去看他，他请我到帝国饭店吃了晚饭。饭后，贵志告诉我：日本军人要闹事，要占满洲，这不仅是日本的国策，其中还有一心要消灭张学良的私仇问题。我明白，他这是指土肥原贤二对张学良的个人宿怨。土肥原贤二原来是张作霖的顾问，张学良当权后驱逐了土肥原，换柴山做他的顾问，所以土肥原怀恨在心，一直想置张学良于死地而后快。最后，贵志语调沉重地说：“目前情况是非常紧张的。”

当时，我还很年轻，胆子也大，拜访了这些人之后，我就越

发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既然来了，没弄清头绪怎么能走呢？

见过贵志的第二天，我决定去见土肥原。我先到他家，他妻子告诉我他到偕行社开会了。偕行社是日本少壮军人经常聚会的地方。我马上雇了汽车到偕行社，我先拿出名片交给接待员，说我要见土肥原。接待员让我在楼下客厅里等着，就上楼去了。这时我听见楼上闹哄哄的，有人在声嘶力竭地作演讲。不一会儿，柴山手里拿着我的名片从楼上下来了。他满脸通红，见到我也来不及握手，就紧张地说：“宁桑，您来这儿干什么？您在这儿是要送命的！您快走吧，这儿太危险了！您在这儿有立刻被杀死的危险，不光是从这儿走，还要赶快回国！”我说，我想找土肥原谈谈。柴山用手指指楼上着急地说：“咳，您怎么还不明白，您没听见吗？这个大声演讲的人就是土肥原。您不必见他啦！您必须赶快离开日本。”我只得离开偕行社。回到帝国旅馆，回想了一下同这些人的谈话，感到事态严重，就马上将这些情况打电报告诉了张学良将军。

去过偕行社后的一天，我发现在银座白木屋百货商店的六层楼上，高高地悬挂起一幅红布白字的横幅，上面写着“支那排日展览会”，我就进去看了。展览会面积很大，墙上贴有沈阳、北平、天津、上海等城市抗日组织的情况图表，各组织负责人和成员的名单、组织分工等内容非常详细，还有许多照片。我特别注意看了一下沈阳地区的抗日组织情况，上面列有阎宝航、杜重远、王化一、高崇民、车向忱等人的名字。日本当局竟然能调查得如此详尽，实在出人意外。展厅里还陈列了两个炸死张作霖的炸弹模型，象西瓜那么大。在展厅的尽端，有一个挂着布帘的房间，门口站着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不时对他认为合适的人点点头，请他们进去。我为了看看究竟也往里走，他打量了我一下，

没发现我是中国人，也冲我点点头让我进去了。我进去一看，非常吃惊，墙上挂满了中国人杀罪犯，砍头、“凌迟”、当众割妇女乳房、把尸体赤裸裸扔在街头等侮辱中国人的照片。看后我非常气愤。后来我弄清了这个展览会是日本“在乡”（即预备役）军人和“黑龙会”、“大华会”等浪人组织出面搞的，其后台就是日本参谋本部。展览的目的就是向日本人宣传中国人多么野蛮，煽动反华情绪，为发动战争，灭亡中国作舆论准备。

看完展览回到旅馆后不久，参谋本部的林桂中将来拜访我了。林桂是大仓喜七郎的女婿，以前我在东京留学时曾多次拜访过他。林桂和张家父子也是有交情的。我注意到林桂没有穿军服，而是穿了一身西装。见面后他对我说：“今天我来看您是极不方便的，作为军人在这时是不应该和您这样的人接触的，不过我和张家父子有这层关系，我不得不来和您谈谈。第一，您必须赶快回去，您在这儿很危险，不可在日本久留。第二，目前的事情（指东北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决定，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日本和支那的关系现在非常紧张，所以我希望您今天就走。”林桂没呆多久就告辞了。

经过这几天的活动，我感到情况越来越紧急了，日本对中国已是剑拔弩张了。于是我又急电告张学良将军：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如不信，可再派人来看看。9月初，张学良又派汤尔和来到东京。这也反映出张学良对日本的阴谋既有警觉又有幻想的矛盾心理。和汤尔和见面后，我把到东京后的情况告诉他，他听后对我说：“你还年轻，现在怎么会打仗？没这样紧张吧！”我让他去见币原外相和南陆相。他见过币原回来很高兴，说：

“我说嘛，怎么会打仗！”币原向他宣传的还是“经济外交”政

策。可是他从南陆相那儿回来后，脸都变色了，说南陆相发怒了，指责我们为什么不解决“万宝山事件”等等。我对他说：

“当今之计必须赶快通过外交途径先就解决‘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和东北铁路问题，跟日本驻沈阳领事接上头，我俩必须先回去一个人办这件事。”于是他决定回国。汤回到沈阳后，和臧式义等人一起与日本驻沈阳领事馆领事河野正式接头，开始办“经济外交”。河野向日本外务省作了汇报，这是日本外务省求之不得的。

汤尔和回国后，我急于想进一步了解南陆相的态度，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天下午，我打电话给他的副官长，约好第二天早上8点到陆军省会见南陆相。第二天清晨刚要走，就看到报纸上头版头条用大字标题刊登的日军攻占沈阳的消息。日本军人到底下手了。事情到此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决定不去见南陆相了。当时我想不能现在就走，日本人民对占领沈阳也并不是特别拥护。我还要在东京呆几天，看看事态的发展。以后，我发现日本特务不止一次地搜查过我的房间，由于我的密码本是随身藏着的，他们什么也没得到。

不久，我看到日本报纸上登了南京政府派齐世英到日本的消息。齐世英是东北人，曾在日本留过学，在东北军做事，后来跟着郭松龄倒戈，郭战败，齐就跑到日本驻锦州领事馆，从那儿跑到关内投靠了陈立夫、陈果夫。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派他到日本也是摸情况来的。于是，我去齐下榻的车站旅馆找他。到了车站旅馆一看，他房间里坐满了日本右翼组织“黑龙会”的浪人，正围着齐世英拍桌子大骂，问他来日本干什么。我见此情景就退出来了。等到晚上10点多钟了，我又去找他，他连门也不敢

开。我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叫宁向南，我不会对你有什么不利的。”他这才开门让我进去。见面后，我问他来东京的任务，他告诉我：“九一八事件出来后，南京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叫我来摸摸情况。”我问他摸得怎么样了。他说：“连门都没办法出去，还摸什么情况！”于是，我向他讲了在东京我所了解到的情况。他听完后说：“我在这儿行动不自由，我不能再呆下去了，你给我讲的这些情况已经很够用了，可以向中央汇报了。我得赶快走，可是东京车站的这些‘黑龙会’的老头子捅我一刀怎么办？”我说：“不用说‘黑龙会’的老头了，就是新闻记者你也应接不了。你再呆下去也得不到什么消息了，我帮你想办法。”我先到车站问讯处，问清了从东京开往神户的火车要在横滨的下一个小站停车加煤加水。于是我为齐买好了到神户的车票，是7号包厢，又把齐的箱子提到问讯处，给了那里的那个人10块钱，让他到时间把箱子放到7号包厢。之后，我又雇了一辆能跑长途的汽车。一切准备好之后，我和齐装作出门散步的样子，坐上汽车一下开到了横滨的下一个小站。时间不长列车就进站了，齐临上车前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宁先生，您在我困难的时候救了我，实在太感谢了。”最后，他又感慨万千地说：“张家父子为了对付日本人，真是费尽了心机呀！”

送齐世英走后，一天晚上，已经10点多钟了，突然有人打电话来。对方说他叫永井柳太郎，是递信大臣，民政党的书记，约我第二天早上7点钟到他家，有重要的事要谈。他说：“如果你7点钟不来，机会就没有了，就会耽误很重要的事。”并且嘱咐我去他家时不要坐帝国旅馆的汽车。我以前来往的人当中没有这么个人，但我决定还是去。第二天早上6点多，我从帝国旅馆后门

出来，在路上雇了车到永井家。永井家的女佣人把我引到客厅。

我看见永井正在安他的假腿。他先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说：

“目前日本军人要想夺政权，不听约束，任意乱来，已经占领了沈阳，这是民政党若槻内阁所不赞成的。今天要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币原的对华经济政策，也就是若槻内阁的对华政策。情况已经有所转变，有可能不打仗。你最好今天就回去，告诉你的政府，永井代表日本政府希望能在经济政策问题上进行商谈。如果能得到你们政府的合作，使经济政策得到成功，我们就有力量了，内阁就可以压制军部，使关东军势力不越过锦州，内阁也就不会倒台。如果我们的经济外交政策不能成功的话，我们就压不住军人，下一步就是倒阁，日本军人就要夺权组阁。情况实在很紧急了，所以希望你今天就走，要争取得到你们政府的同意。如果有了结果，还是你亲自来东京，直接到我家里来，千万不要打电报，也不能告诉别人。”

从永井家出来，我当天就启程回国了。9月底，我在北平见到了张学良将军，向他报告了我在东京的所有情况。他听完汇报说：“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蒋委员长，我要听听他的意见再办理这件事。”以后蒋介石也没拿出什么办法来，只是命令张学良不抵抗，撤到关内。东北随即也就全部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了。

这次东京之行，使我了解到日本若槻内阁和青年军人在变中国东北乃至整个中国为其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大目标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仅在于用什么样的手段达到这个目的。占领中国是当时日本的既定国策，九一八事变是他们实行这一罪恶计划的开始，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走向死亡的第一步。

周宁 整理

（北京市政府参事室供稿）

淞沪抗战时的幕后活动

——蒋作宾日记摘抄

蒋作宾 遗稿

作者简介：蒋作宾，字雨岩。湖北省应城县人。生于1884年农历三月初四。

蒋15岁时（1899年）考中秀才。1902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因与宋教仁同一宿舍，受宋的影响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1905年毕业后被选拔为官费留日学生，入东京成城学校。是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蒋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翌年7月毕业返国，由清政府派往保定军官学校任教官。1909年参加清政府举行的陆军留学毕业学生考试，获优等第二名，遂调至陆军部军衡司任科长，蒋因才能超群，不久即升任司长。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蒋作宾被任命为陆军部次长。

蒋作宾积极参加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北伐军到达武汉后，他被任命为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并参加“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蒋作宾又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员。

1928年4月，蒋介石以“统一全国”之名，开始第二次北伐战争，蒋作宾担任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军北上。6月底，北伐完成，战地政务委员会随即结束。此后，蒋作宾转任北平政治分会委员。是年10月，他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驻德国公使兼领奥地利公使，年底从沪启程往柏林赴任。1931年8月13日，蒋作宾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驻日公使，免去其驻德公使兼领奥地利公使的职务。蒋于同年9月往东京赴任途中，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12月回国参加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会上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蒋正在国内。此前，南京国民政府由于外交无人负责，中央政治会议乃于1月27日组织外交委员会^①，设委员若干人，常委有蒋作宾、王正廷、顾孟余、顾维钧、罗文干等五人，政治会议并指定蒋作宾担任该会常委会主席。《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于7月9日始返日述职，负责直接与日本政府交涉、处理有关中日关系问题。

1935年5月，中日双方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蒋作宾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国首任驻日大使。

1935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后，蒋奉调回国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免去了他的驻日大使职务。

① 外交委员会是国民党政治会议所属的临时机构，其权限有四条：

一、外委会对政治会议负责；二、外委会对外不发表命令；三、外委会决议案交外交部长执行；四、外交重要方针外委会须提请政治会议决定。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于11月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上任仅两个月，因实行军政统一，即被李宗仁接替，于1938年2月卸任。随后即赴重庆，专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0年冬出任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政务组主任，1942年元旦，因病卸职休养。1942年12月24日在重庆病逝，终年59岁。

郑玉纯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晴

今日又开外委会，蒋、汪均列席，议决外交进行方针。晚开政治会议及党部常务会议，推汪兆铭为行政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长，罗文干为外交部长。夜间，日军与我军发生冲突。闻日人要求市府已全应允，日军尚施暴行，其有意捣乱，可谓无微不至矣。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晴

日军在沪肆行蹂躏，用飞机二十余架炸毁闸北一带交通及文化各机关，居民亦大遭杀戮。我军抵抗，毙敌亦不少，掳获铁甲车四辆，打落飞机一架。至夜8时，由法、美诸国领事出面调停，暂告停战。夜开外委会，决议致牒九国公约国并发宣言。

一月三十日 星期六 雨

日军在沪肆行屠戮（戮），我军积极抵抗，战事颇为顺利。政府现已决心取正当防卫。唯政府地点必须取立于不败之地，故议决迁